



## 在那高高的冠峰山上(下)

□王剑波

### ■《冠峰》报

1974年,学校以“大批判习作组”的名义创办了一份小报,取名为《冠峰》。《冠峰》报创办的目的当然不完全是为了“批林批孔”,更主要的是作为学生的习作园地,但刊登的文章肯定少不了这方面的内容,由此也留下了特殊年代的痕迹。

学校成立了《冠峰》报编辑组,陈贤能老师是主编,我作为编辑组的骨干,在陈老师的指导下,学会了刻蜡纸,熟悉了组稿、编辑、排版、刻写、油印和分发的全部流程,干起来劲头十足,课余时间基本都花在这上面。《冠峰》报每期两张8开纸,每大周(学校采用两个星期为一大周、周末放假两天的作息制度)出版一期,每到出报之日,编辑组的同学总要加班加点,忙得不亦乐乎。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大周除了作文之外,不管是否采用,必须为《冠峰》报提供一篇稿件。同学们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《冠峰》刊登,因此写作热情都非常高涨。

《冠峰》报的发送范围是全县各个“五·七学校”和普通中学,一部分通过同学们周末回家捎带过去,也有一部分采用邮寄。当时全县其他中学都没有自办校报,《冠峰》报的创办产生了一定影响,县教育局曾几次表扬,说冠峰中学这样的学校能办出这样的校报,值得各校学习。在毕业之后的1976年,一次去县城,我无意中参观了县里举办的“教育革命成果展”,在展厅里竟然看到了《冠峰》报和我的一本作文簿。

当时,令我印象最深、感到最兴奋的,是县广播站采用了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刊登在《冠峰》报上的

文章。记得是一天傍晚,山野一片寂静,我站在广播喇叭下面,听着从遥远的县城翻山越岭传送过来的声音,当听到播音员念出我的名字和我写的文章时,我禁不住激动得喊出声来。老师和同学们闻声而来,也都兴奋不已。

《冠峰》报成了我最初的写作园地和最早的“工作岗位”,每一次捧着新印出的飘着油墨芳香的报纸,我都会品尝到劳动的快乐,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

### ■“开门办学”

那时候强调“开门办学”,虽然我们学校本来就是半农半读,但同样要求学生走出校门,到农村去,到贫下中农中间去办学。

记得是1974年的秋天,正是晚稻收割的季节,我们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,下山到了王爱公社的高塘、夏孔、西山等大队,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,白天帮助生产队割稻,晚上在昏暗的队屋里向社员宣讲理论。同学们按照分到的题目,很早就开始准备,我宣讲的内容记得是批判“好曲没有三遍好唱,好话没有三遍好讲”,大意是要永远学习、宣传、坚持继续革命理论。虽然我们这些讲的人“阿宝背书”般一知半解,听的人在“老烟盅”散发出的呛人烟雾里昏昏欲睡,但同学们还是十分认真。

我们还编排节目,到学校周边的村庄去演出。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节目,一个是小话剧《追报表》,讲的是生产队统计员为了一分钱的误差,千方百计追回已经送出的报表;再一个就是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选场“深山问苦”。学校地处山区,没有外力可以借用,同学们就自导自演,一人就

演了统计员和杨子荣两个角色,还兼任报幕。每次到山村演出,古老的祠堂总是挤满热情的村民。我们也十分卖力,非常高兴能为难得看戏的山里人送去欢乐。演出结束后打着手电赶回学校,大家似乎还沉浸在兴奋之中,深夜的山路上洒满了歌声和笑声。

学校还曾组织我们班级的同学去山村小学讲课。我去的是兰田庵小学。虽然只上一节课,但每个人都认真备课,作了充分准备。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个学生的山村小学,山里孩子对我们这些“老师”的到来充满了好奇和惊喜;孩子们的神情也使我们感到作为“老师”的光荣和责任。我们班里不少同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,成了真正的老师,这次实习也许为他们打下了为人师表的最初烙印。

### ■生活

班里的同学大部分来自那时的行政单位县属岔路区的各个公社,也有几位是其他区的,甚至有奉化的。每到第二周星期五的下午,大家浩浩荡荡出山,星期日又相约结伴,挑着在校12天所需的粮食蔬菜,爬山涉水返回学校,往往中饭以后从家里启程,到校时已是暮色四起。为了防止带来的粮食前吃后空,必须计算好每天的定量,我将热水瓶盖划上刻度作量杯,早餐少些,中晚餐多些;有劳动课时饭蒸得干一些,不劳动的时候就稀一些。带的菜大多数是盐炒黄豆、咸菜和豆瓣酱,里面加上一些肉丝算是最好的了。怕时间长了菜要霉变,我带了两个饭盒,一个蒸饭,一个用于全班同学轮着蒸菜。一次在返校的路上,系帆布袋的绳子断了,袋子滚到十几米远的山坡下,等我小心翼翼地爬下去去捡,发现装菜的玻璃瓶已经破碎。那次带的是咸带鱼,只得拣去玻璃渣子,洗干净了再吃。学校养了几头猪,每个学期会有一次会餐,桌上就是一个菜:洋芋烧猪肉。会餐按照班级分小组领菜,每个小组一盆。会餐这一天,就是我们的盛大节日。

冠峰山高春来晚,风大雾气多,到了农历三月还会遇到冻雨天,风、雨、雪子一起来,草叶上、树枝上结起厚厚的一层油冰。到

了夏天,地潮湿气重,有的同学身上发了湿疹,奇痒难忍。晚上蚊子密集,只得在教室和宿舍四周点起艾草驱蚊。隆冬季节经常出现零下十几度的天气,路上、屋檐上到处是冰凌。遇到大雪封山的日子,万籁俱寂,极目望去白茫茫一片,真正是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,这时,我们只得“围炉读书”了。当然高山上也有美景。到了清明时节,冰雪消融,山泉叮咚,杜鹃盛开,百花争妍,竹笋拔节,树枝抽芽,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。秋天也是好季节,白日天高云淡,夜晚清风明月,令人神清气爽。

我们在那高高的冠峰山上,学习、劳动、生活了两年半,接受知识,锻炼身体,有喜有忧,有苦有乐,经受磨炼,也收获希望。1975年的夏天来了,我们的高中生活也要结束了。同学们带着半是兴奋、半是留恋的心情,告别老师,告别亲手建造的校园,告别郁郁葱葱的茶山,沿着走过无数次的山路,走出大山,走向各自的远方。

### ■后记

毕业以后我曾几次重返冠峰。冠峰中学从原先的高中改为初中、小学,直到1995年停办。这所学校从初创到鼎盛、衰落及至撤销,22年的历程划出了一条时代的轨迹。我盘桓在学校旧址,岁月变迁,物是人非。当年建造的校舍还在,但已经听不见朗朗书声;当年开垦的茶园依旧葱茏,但已经看不到采茶的身影;石墙上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标语依稀可见,但实践这种理念的人们已经云散四方。

我们这些在特殊年代度过少年时光的人,在回忆那些往事的时候,总是感触多重,甚至彼此矛盾,对于出现在那个年代的“五·七学校”,也是如此。站在今天回望过去,对当年的办学地点、办学方式,理性告诉我们并不可取。但作为一个亲历者,因为“五·七学校”,让像我一样的一大批人,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;也因为那段经历和人生的青葱岁月联系在一起,情感上又有着一份感念。

“冠峰”已经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,但那些日子不曾忘记;“冠峰”已经成了一个符号,但想起它,便想起了时代的印痕,想起了一代人的风雨历程。